

——故宫博物院举办“《清明上河图》及宋代风俗画国际学术研讨会”

张震

重识经典

2005年10月10至11日，为迎接故宫博物院80华诞，进一步推动对《清明上河图》的深入研究，在《清明上河图》展出的同时，故宫博物院举办了“《清明上河图》及宋代风俗画国际学术研讨会”。国内和美国、加拿大、日本以及港、澳、台地区37位卓有成就的美术史学者、建筑学专家出席会议。其中，国内代表有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傅熹年，辽宁省博物馆研究馆员杨仁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金维诺、薛永年，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研究馆员肖燕翼，研究馆员杨伯达、杨新，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主任、研究馆员单国霖，研究馆员钟银兰，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徐书城等人。国外代表有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部主任何慕文，英国伦敦大学荣誉教授韦陀等。港、澳、台地区的代表有香港大学教授万青力，澳门艺术博物馆副馆长陈浩星以及台湾大学教授傅申等人。

本次讨论会共分三场，分别由何慕文、杨新、薛永年主持。会议代表就《清明上河图》的传承、著录、定名、作者、研究历史与现状以及画面透露的历史信息等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结合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清明上河图》讨论了宋代风俗画的定义等问题，并且对其它几幅宋代风俗画的内容、定名进行了分析。

桥梁建筑专家唐寰澄结合自己参与考察、设计、建造类似《清明上河图》中的虹桥——贯木拱桥的实例，对该图中的虹桥进行了细致的讲解，从建筑学的角度论证了虹桥是宋代创造的木拱桥，它一座实际存在的桥，并且为中国所独有，以往研究者一般认为《清明上河图》中虹桥两头带有鹤形物的高竿是风向标，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薄松年则参考大量的历史文献予以详细辨别，指出虹桥两头的高竿是虹桥建筑的组成部分——华表，而不是风向标。薄松年还指出了《书画传习录》中多处谬

误，认为该书对《清明上河图》作者张择端的记载是不可信的；故宫博物院前副院长、研究馆员杨新认为当前国内对《清明上河图》的研究有偏差，他指出，关于故宫博物院收藏本为“摹本”或“残本”的观点借助报刊、杂志流行于世，这些说法荒唐可笑，本来不值一驳，但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杨新还强调对《清明上河图》原作的研究应该关注它在流传过程中与当时社会的密切关系以及反映的世风与时变，而当前国内对该图的关注、研究视角偏狭，这个现象同样值得重视；韦陀教授表示要认识故宫藏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真正特性，要认真研读后来复制的“清明上河图”并特别注意它们与原图比较，对有关该作品图像传承的几个问题进行分析，进而指出它们对解读张择端原作的意义；美国纽约大学艺术研究所教授乔纳森通过对《清明上河图》和其它宋代绘画作品的比较，并引用相关文献，对当前学界公认的说法——《清明上河图》的作者为北宋张择端提出质疑；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美术史系副教授曹星原认为《清明上河图》被不断复制的原因主要是特定的文化语境要求绘画作品充当社会和文化价值的载体。鉴于《清明上河图》具有重要的社会、文化价值，有学者在会议上提出了“清明学”的概念，美国康奈尔大学艺术史系教授潘安仪对以往关于《清明上河图》的研究进行了细致的归纳、分析，强调了“清明学”所涉及的各种问题。故宫博物院信息资料中心顾问姜斐德博士则系统总结了西方学者研究《清明上河图》的历史及成就。

故宫博物院老专家、当年保管《清明上河图》真迹的工作人员许忠陵介绍了该图



【宋】张择端 清明上河图 局部

在流传中经历的装裱情况及其在1953年重回故宫时的破损情况，同时详细讲述了在20世纪70年代，《清明上河图》真迹在历史上最后一次被修复的经过。他指出，当时的装裱修复均由国内最好的专家经手，并进行了详细记录，如装裱中的补画接笔，何处该揭去旧卷、何处接笔不好或是接错应重接等，都一一记录在裱前的照片上，作为装裱的依据。同时，凡接笔之处，先由经验丰富、技术高超的画师画出小样，经专家审阅同意后方可正式在画上接笔。许忠陵还说明了在那次《清明上河图》的装裱中发现了明代的装裱问题并予以纠正的情况：原画起首处绘有一农舍，画卷在此有破损，只剩下凉棚一角和老人、小孩的形象。明代裱画师未能将图像审识明白，误以为残剩的棚架一角是一头毛驴的两只耳朵，于是在补绢上添画了一头毛驴和板车局部及部分瓦屋屋顶，毛驴的造型严重失实，补绢十分粗糙，画风不符，接笔不合。鉴于此，在那次重装过程中，经领导、专家集体讨论，决定按照文物修复工作的基本原则，将这块明代补绢去掉，作为资料存入档案，另找一块与原作相近的旧绢补上，为了保持原作风貌，在此处不再接笔，恢复原有旧损的面貌。

与会代表普遍认为，目前对《清明上河图》只能说“知之甚少”，以后的研究课题还有很多，这也正是这幅古代绘画珍品魅力所在。□

张震 故宫博物院古书画部